



# 巴中 我永远怀念的母校

## 北京 50年届 梁英明 5

上午上课，因为校舍狭小，也没有足够的体育活动场地，学生下课后，只能分散到玉融公会的体育场打球。那时，梭罗的羽毛球运动很普及，还经常举办城市间的羽毛球比赛，却还没有正规的室内羽毛球馆。比赛多半选择在周末晚上举行，主办者一般租用一座大型仓库作为场地，加装几盏大的煤气灯提供照明。这些临时比赛场地当然没有观众座位，狂热的球迷们只能坐在地上或者站立观看。尽管场地简陋，每次比赛都吸引不少观众，在场外不时可以听到观众鼓掌叫喊的声音。我是这些热情观众之一。

每天下午，我在家做完功课后，都要按照父亲的要求，练习毛笔字，包括两页九宫格的中楷和一页小楷。祖父留下的墨宝成为我最早临摹的范本。不久，我开始临摹颜鲁公（真卿）和柳公权的书法。家里的少量藏书是我的主要课外读物。这个时期，我读了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》《西游记》等古典名著，以及《蜀山剑侠传》《七侠五义》和《隋

唐演义》等小说。这些书使我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初步熏陶。

### 梭罗侨众生活社

日本投降后，梭罗一些爱国华侨青年成立了一个小团体，称为侨众生活社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个团体似乎有些神秘。我不知道它的会所在什么地方，有多少社员，也不了解它有些什么活动，只知道我认识的几位比我年纪大的同学都曾是这个团体的成员。后来才有人告诉我，在雅加达、泗水、三宝垄等地都有这类团体。

日本占领时期，印度尼西亚一些爱国华侨曾参加秘密的抗日组织，称为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，并在梭罗设立了一个支部。梭罗侨众生活社的创建者和骨干就是原大同盟的成员游禄中、钟翠兰、李笑梅、张春山、李尊贤、李最贤等人。我后来得知，侨众生活社曾经想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队伍，但因为我当时年纪太小，最终没有让我参加，而只告诉我可以到他们的图书室借书看。他们的图书都是在中国大陆或香港出版的新

书，存放在我的一位同学的家里，图书的内容大体有两大类，一类是文艺小说，如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等。另一类是《大众哲学》《社会发展史》等通俗理论读物。我在课余时间，曾借阅这些书籍，而且很快便被这些书中的新思想、新观念所吸引，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美丽的憧憬，尽管它还只是模糊而浪漫的理想。在我当时读到的新书中，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对我的影响最大，可以说它是我日后走向革命的启蒙读物。

梭罗侨众生活社的兴旺时期似乎不长。由于荷兰殖民者发动战争迅速占领雅加达、泗水、三宝垄等沿海城市，新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被迫退守到中爪哇的日惹和梭罗地区，对外交通几乎隔绝。侨众生活社那些朋友和同学大都先后离开梭罗，我也没有再听到关于侨众生活社活动的消息。不过，1947年7月我到雅加达巴中读书后，又见到了它的一些骨干成员，也知道在雅加达有一个称为大众社的类似团

体。这时，我逐渐明白侨众生活社和大众社在华侨社会里的影响和作用，我没有加入过这两个团体，但后来与它们的许多社员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。

### 考入巴城中学

1947年6月，我在梭罗华侨公学读完初中。当时，梭罗华侨创办的华文学学校都没有高中部。初中毕业后想升学，只有到巴达维亚（雅加达）、泗水或三宝垄等大城市去。父亲和学校老师们商量的结果，决定让我到巴达维亚巴城中学继续学习。

7月11日，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坐火车去巴达维亚。父亲在巴达维亚有一位老朋友冯伯伯，他在草埔有一家经营贸易和汇兑的“平平公司”，我就住在公司的楼上。那两位同学也分别住到他们的亲友家中。我很幸运地考入了巴城中学高中部。

巴中是1945年10月创立的一所新学校，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司徒赞老师，其他老师如刘耀曾、李易洪、刘宏谟、刘宏谦、韦同芳、曹雪贤、林苍、温鸿琳、黄城

温、张德基等，大都是来自八华等著名华校的老教师，学识渊博，教学经验丰富。因此，巴中建校初期的师资力量就已经很强。后来又有一些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的陈熙泽、钟士民等老师来到巴中任教，《生活报》总编辑郑楚耘和《新报》编辑陈寒冰先生也曾到巴中兼任教师。这样多的优秀教师聚集到巴中，是巴中在当时特殊年代恰逢的机遇，也是当年巴中学生的幸运。

司徒赞校长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中一位令人尊敬的教育家。他毕业于广州暨南学校（暨南大学前身），曾在印尼文池兰中华学校和巴城广仁学校担任教师和校长。他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和宽厚待人的性格，在华侨教育界赢得一致赞誉，这使巴中对优秀的教育人才具有很大吸引力。司徒赞老师在华社各界的广泛深厚人脉关系，也确保巴中能够获得足够和稳定的经费支持。

物理课老师韦同芳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。韦老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严谨求实和